

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

吴摇松摇等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校对：段建堂 摇彭遵义

摇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报数据核字(圆园园)第 圆 号

定价：圆肆玖元

目摇摇录

引言	(员)
第一章导论	(员)
摇一、中国农商关系思想的演进嬗变	(员)
摇二、中国农商关系思想的基本特征	(圆)
摇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与社会进步	(圆)
摇四、中国农商关系思想的剖面透视	(猿)
摇五、中国农商关系思想演变的逻辑	(猿)
第二章早期的“农商俱利”观念	(源)
摇一、早期重农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源)
摇二、早期重商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缘)
摇三、重农与重商意识的并行发展	(远)
摇四、“农商俱利”及其历史地位	(苑)
第三章从“农商俱利”到“重农抑商”	(苑)
摇一、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	(苑)

摇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苑)
摇三、农商关系从双重并行到合二为一的转变	(愿)
摇四、“农商俱利”向“重农抑商”的演化	(怨)
摇五、“重农抑商”政策的初步实施	(员)
摇六、“重农抑商”的实质和影响	(员)
 第四章摇“重农抑商”的巩固与发展	(员)
摇一、秦汉商业双重作用的增强	(员)
摇二、秦至西汉中叶的重商思想	(员)
摇三、秦至西汉中叶的抑商思想	(员)
摇四、重商思想与抑商思想争锋	(员)
摇五、“重农抑商”政策的扩张	(员)
摇六、盐铁会议上的农商关系思想	(员)
 第五章摇从“重农抑商”到拒斥商品经济	(员)
摇一、商品经济衰落与庄园经济崛起	(员)
摇二、王莽的商业政策及商业思想	(员)
摇三、汉晋间的抑商政策	(员)
摇四、排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员)
摇五、王符对“本末论”的新阐释	(员)
摇六、傅玄的“轻商而不废其业”	(员)
 第六章摇农商关系思想峰回路转	(员)
摇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商业价值的凸现	(员)
摇二、商业政策的调整	(员)
摇三、“商业富国论”的出现	(员)

摇四、“农商相补论”的形成	(圆园)
摇五、重商理论的兴起	(圆园)
摇六、“农商并重”厘革“重农抑商”	(圆园)
摇七、“工商皆本论”及其历史意义	(圆园)
 第七章摇走向思想启蒙的“农商并重”理论	(圆缘)
摇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商关系的调整	(圆元)
摇二、“农商并重”理论的发扬光大	(圆源)
摇三、“农商并重”理论的启蒙意义	(圆缘)
 第八章摇“商战论”与“实业论”在近代的勃发	(圆缘)
摇一、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与近代农商关系的变化	(圆元)
摇二、“重农抑商”思想的破产	(圆缘)
摇三、“商战论”的确立	(圆园)
摇四、“实业论”的兴起	(猿猿)
摇五、近代农商关系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猿怨)
 后摇记	(猿圆)

引 言

任何一门学科，不管它产生的时间有多短，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而对这一历史的探究，均可以选择和运用相应的学术方法和分析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而言，既有好几个版本的通史专著，又有从财政思想、赋税思想、货币思想、土地思想、人口思想等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诸多论著。这些论著，几乎都是遵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根据所定问题的需要，经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排比、归类和综合，再按朝代或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顺序，精心组织而成的。无疑，它们对人们意欲了解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或历史上的某一经济思想，

或某一朝代的经济思想，都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正是通过对这些论著的认真阅读、仔细研究和诚心体悟，我们感到，能否在史家们卓有成效的习惯做法之外，通过对某一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或问题的提炼、剖析和研究，辟出一条用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逻辑来穿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问学途径呢？倘若这种努力并非荒唐而是合理且能成功的话，那我们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丛林”中，对哪些是大问题或小问题，哪些是真问题或假问题，哪些是原生问题或派生问题的辨析，或许会显得更为清楚一些。

那么，在源远流长、问题庞杂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究竟哪一思想或问题堪称“极其重要”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和思考，我们认为，该问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具有折射性，即能折射和反映出每一朝代的政治运作和政策实施；第二，它必须具有统摄性，即以它作为基本问题和轴心，能统摄其他经济问题并规定着其他经济思想或范畴，亦即诸多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第三，它必须具有贯通性，即以其演变构成一条鲜明的线索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第四，它必须具有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即思想的展开同时也是事实的展开。因此，我们的先行工作，无疑是要首先找到和确认构成这一思想的基本要素。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经济思想范式的转型或革命，而这些转型或革命一旦成功，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将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调整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思想范式。同时，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将在一定时期内为这一新范式所左右。反观中国，固然从未有过类似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经历，但却有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思想，其每一变化和转折都迫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

整。这一问题 and 思想是什么？我们认为，那就是农商关系问题及其思想。此其一。

其二，农商之分在中国古代一经出现，历史上的“本末”、“轻重”、“贵贱”、“义利”等问题和范畴所关注的焦点，马上随之集中到农商关系问题上；中国经济史思想中的财政、赋税、土地、人口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也随之围绕农商关系问题而展开。这一点，可在史料中找到很多证据，我们也将本书中加以进一步的论述。因此，在中国经济史上，农商关系问题乃是一个在横向上具有渗透性、连带性和包容性的基本问题，农商关系思想堪称一带有统摄性的重要思想。

其三，在二十四史中，几乎历朝都有关于农商关系的诏令，且内容多为“重农抑商”。观乎近代，在 19 世纪 40 至 90 年代分别发生的关于中国命运的两次大论战中，农商关系亦成了人们极为关注的热点。当其时，围绕中国发展的前景和途径的问题，诸多有非凡才智的人机锋迭出、见解纷陈、互相诘难，但他们争论的核心之一，仍不外乎到底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商立国”的问题。时至今日，农商关系问题也仍然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经济问题。我们虽然时时在背诵“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古训。但是，究竟如何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以市场为主导”，把农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来规划和发展，使农业彻底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实现农与商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乃是我国现在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在思想、政策和现实运作各个层面上都必须花力气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四，农商关系思想演变和运行的逻辑反映了中国农商关系问题发展的规律。农商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决定着农商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展开，换言之，事实上的农商关系规定了学理上的农商

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农商关系在学理上、思想上的每一次大的变化，都与现实中的农商关系的重大转折密切相关，同时又直接地影响着农商关系从政策导向到现实运作上的转变和发展，由此而构成了农商关系问题在发展历史和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

上述四种情况，已经将农商关系思想在政治运作上的重要性，在经济思想上的统摄性，在时间上的历史贯通性，在历史与逻辑上的一致性，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可以说，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农商关系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的传统经济思想。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巨，是历史上其他任何经济思想都不能比拟的。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商关系思想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切入点，以期通过对该思想的审慎而又认真的研究，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用思想展开的逻辑主线串起来，从而为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提供一种新视域和新角度。

然而，关于农商关系的思想，果真像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那样，是由一根“重农抑商”的思想线索而毫无波折地缓缓延伸过来的吗？不是的。根据我们对上古史料和其他一些史料的认真研究，发现农商关系在思想形态上大致经历了“农商俱利”、“重农抑商”、“农商并重”（在近代延伸和扩展为“商战论”与“实业论”）三个大的阶段，在演变的过程中亦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及其相互关联。不过，对于农商关系在思想形态上所呈现的具体问题，本书各相关章节将会做尽可能详尽的论述，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谈一谈思想形态之成为事实存在的那个“理”。

其实，“农商俱利”也罢，“重农抑商”也罢，“农商并重”也罢，都有其势所必然的理由和根据，亦即“理在事中”，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农商关系思想之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三个演变阶段，是有其客观的“理”或必然性的，对于这其中的“理”或必然性，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是主观的方面，这具体表现在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财政需要和对经济财富的垄断需要这三点上。春秋战国之前，群雄并起，干戈不休，存亡不定，故“农商俱利”思想得以行，盖因群雄都看到了农与商皆能为自己安邦定国创造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最典型的例子可见《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载：郑本在周畿内，桓公东迁，并与商人俱。因为东迁之郑为新造之邦，财用必患不足，不得不靠商人来通有无。闵公二年又载，卫为狄灭后，卫文公吸取亡国教训，“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因此，“农商俱利”成为一思想形态或事实，乃是为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诸侯纷争，结果剩下七雄，问鼎之局略成，“重农抑商”思想即开始萌。时至秦嬴汉刘霸业成，“重农抑商”终成为一种事实、政策和思想。究其原因，一则商人周历四方，远适异国，见闻较广，因而才智颇高，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郑商人弦高以匹夫而却“虎狼之秦师”，即显示了商人的过人之处；二则商人的政治意欲日隆，战国时即出现的商人多与王公贵人为缘，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情况，到秦汉时更发展到如此地步：“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这两种状况，必然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妒忌、担忧和惊恐。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从政治需要、财政需要、财富垄断需要出发，从思想、政策到现实运作三管齐下来贬商、贱商、损商、抑商，亦在事理之中。到了唐以后出现的“农商并重”理论，则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朝的“国威遐畅”，二是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展，三是东西方商业交流的日益频繁，四是交通情况的极大

改变，五是社会舆论发生了新的转向。日本桑原鹭藏在《东洋史要》中说：“东西陆路之互市，至唐极盛，先是隋炀帝时，武威、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枢。西方贾人，来集其地者，溢四十国。唐兴，中亚天山南路之路开，西方诸国，来东方通商者益盛。支那人之商于中亚波斯印度者亦不少。”又说：“自蒙古建国，四方割据诸小国悉灭，商贾往来日便，又新开官道，设驿站，分置守兵，旅客无阻。东西两洋之交通，实肇于此。是时西亚及欧洲商人陆自中亚经天山南路，或自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开贩路于和林及燕京。波斯与印度及支那之间，海上交通亦日繁，泉州、福州诸港，为世界第一贸易场，外人来居其地者，以万数云。”在社会舆论上，南宋的叶适和陈亮便旗帜鲜明地为商人正名和张目；到了明代，此势头更旺，如大思想家王阳明和著名文学家李梦阳等人，均为商人写过不少的铭、表、记、状。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迫使唐以后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把农商关系思想作为机括，以突破“重农抑商”的思想藩篱而采用和实施“农商并重”的政策和思想。据史料记载，互市置官，始于隋之互市监，而唐因之。《文献通考》也说过：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而这些官职的设置，都是用以征收和管理关税的。可见，“农商并重”成为思想、政策和事实，有它存在的“理”，亦即有它的必然性。“商战论”和“实业论”的兴起，既是中国农商关系思想演变第三阶段的组成部分，即明清时期“农商并重论”的延伸和扩展，又是中国在跨进近代化的门坎时，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商业渗透、实业冲击和资本入侵而作出的反应。当时的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大的变局，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也从农商关系入手，搞了一些官办实业和官督民办的实业，同时也为商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增

长并由此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适应了这种增长和进步的需要，“商战论”和“实业论”的应运而生，当属势所必然了。

其次，是客观的方面，这又具体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上。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形态的夏朝，产生于大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患的成功治理，故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除了带有“自给自足”的鲜明特征外，对水利的治理和仰给，无疑成了能保证“自给自足”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对水利的治理（主要是对付黄河）和仰给（包括沿河引水和开发灌溉）所需甚巨，这就迫使历朝列代的封建政府不得不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这上面去。据史料记载，黄河不肆虐时，人民尚可“自给自足”；一旦黄河肆虐，“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能保有这一生产方式已属不易，要想推动它在历史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则无异于蒸砂求饭了。所以，后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与其说主要是军事侵略和政治侵略，勿宁说主要是生产方式的侵略更准确。在社会的积累方式上，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工具的笨拙，效率的低微，以至于人们即便是费尽心力，也仅仅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及仅足以避免饥寒冻馁；天幸有余，也要全部用来“积贮防灾”。于是在极其落后和原始的积累方式上实在辟不出新利源、找得到好方法的情况下，封建王朝采用的经济政策，也只能是鼓励和迫使绝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在此情况下，贾谊、董仲舒、桑弘羊、贾山等一批人，也就不得不到处张扬他们“大利在农”的学说了。

再次，从封建帝王的统治术来看，似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属治人有术而治国无方之辈。无怪乎梁启超有中国的封建专制术在日日进化，而其他方面却在日日退化之叹。考诸史料，我们觉得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思想上，起码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决好

分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和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以至于连管仲这样一个“重农抑商”论者，也把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人君不能治”。再从封建统治者的动机和效果来看，无论是提“农商俱利”，言“农商并重”，还是倡“重农抑商”，实际上都不影响他们对农和商的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采用“重本抑末”思想并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封建统治者，其重农实质上也不是真正的重农，而不过是为了加倍掠夺农人而已，如秦朝时的农民就不仅承担了“二十倍于古”的田赋、“三十倍于古”的劳役，而且还过着“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生活。同样，封建统治者的抑商也不是真正的抑商，而仅仅只是抑私商、小商，目的还在于扬官商，以至于西晋时期出现了那些亦官亦商之人争奇斗富，视民命如草芥的污浊局面。

最后，中国的农商关系思想之所以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还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致思方式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思维习惯上，中国人似乎存在着对问题之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两极化倾向，并且其核心还是泛伦理主义的。对此，著名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曾经评价说：“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及这些问题，主要从伦理观点论述，例如孔夫子和孟子的教义都曾涉及这些问题。”泛伦理主义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思想理论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而且对农商关系问题的危害也不小。因为农业和商业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两大支撑体系，而以泛伦理主义的并且是两极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两大体系，再加上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导向作用，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毫无道理的和简单化的判别，即断然视农民为讲礼义、尊名分、恶诉讼、严器数、务节流、重人情、安苦行之人，而视商人为好言财利、内贿乱政、

结党营私、奢侈无伦、刻薄寡恩、偷奸耍滑、安于懒惰之徒。这一判别姑且不论它与史实的严重不符，仅就它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割裂开来甚或对立起来，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农与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大支撑体系的积极认识，也妨碍了人们对分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和供给与需求关系问题的正确理解。而在道德伦理上，其结果则是，在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的情况下仍然高吟着“愧无半策匡时弊，惟余一死报君恩”的奸佞小人不在少数，而真正具有“责任伦理”的道德勇士却不多。

在致思方式上，中国人从来都不怎么注意知识论的研究，所以中国虽为农业大国，却没有多少专门和系统地研究农业和农学的著述。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自上古以迄明，涉及到农业的典籍，在春秋战国时代，仅有《周官》中的一些零星片断，《管子》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有汉一代，重农最盛，却无农书传世；到了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出，中国才有了最早的农书；其后可道者，官修之书有元代的《农桑辑要》，私家著述则有元王桢的《农书》和明徐光启之《农政全书》。这种情况，一是表明农业和农学的实际应用问题，几乎都为知识阶层所忽视和不屑；二是说明中国人由于不重视知识论的研究，故而很多科学发明虽然最早在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对中国社会最为重要，但却无法去推进它和解决它。因此，从这一层面看，要想求得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改进，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而农商关系问题之所以在客观上形成了前述的几种思想形态，显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西方则不然，由于有古希腊的文化与哲学传统，西方人在古代就很重视知识论的研究。在农业和农学方面，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 3 世纪，德仑休斯·瓦罗就写过《论农业》一书，公元 1 世纪的科卢梅拉也写了《论农业》一书。这两本书对当时农业应用方面的大部分问题，

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其后西方知识界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候、土壤、种子、水利、植物诸问题，几乎都有大量的著述出版。西方人对知识论重视，不但推进其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推进了农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产业革命能够在西方发生，亦是情理中的事情。

我们从上述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农商关系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之成为统摄性问题的基本根据，也表明了我们的理论企图，不过是想通过对这一思想的严肃思考和认真研究，用凸现思想演变和发展逻辑的方式，把中国经济思想史串连起来，从而为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视域。但是，当我们一旦进入实质性的研究状态时，便发现此间问题甚多、难度颇大。在没有现成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又没有现成的分析手段可供使用的情况下，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家巫宝三先生的一段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他说：“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如果不探究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很难了解其经济思想的全部意义。”于是，我们力图结合哲学思想的分析来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对“农商俱利”、“重农抑商”、“农商并重”、“商战论”和“实业论”等思想之哲学底蕴的揭橥和阐述，把构成这些思想的真实动机和内在逻辑梳理出来。

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是：

第一，分析农商关系思想的构成。中国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材料浩如烟海，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材料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感觉、印象、意见和建议，其中固然有些可称之为观点的，但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或理论。农商关系问题却不一样，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思想，首先是有它赖以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其次是它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思想主张；再次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都因实际需要而被不断地外化为一些可以运用和实施的政策

(意见和印象是不能成为政策的)。因此，我们是在经过了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后，再依据史料的历史背景、史料的内容以及内容外化为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三大特征，而认定农商关系之构成为思想。

第二，注重思想的作用。农商关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判别其究竟属正面还是负面时，我们首先采取的是价值中立的态度，即首先让史料说话，用史料来再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一步工作一旦做好了，我们才可能进而分析和论断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大体上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从而揭示出农商关系思想的作用。

第三，系统的分析方法。农商关系思想带有相当大的统摄性，它与很多经济思想和经济问题发生理论关联和逻辑关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为此，我们把农商关系思想的发展放到纵向和横向交合构成的历史坐标上，规勒其基本线索和逻辑理路，并对每一思想形态到底与哪些经济思想和经济问题发生过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怎样产生和演变的，都力图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辨析。求全的动机是为了求真，而要求全则非得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不可。

第四，史论结合的方法。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但这一逻辑离不开历史事实的验证和支撑。我们之所以把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将它视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因为我们的分析手段先要力求完整地再现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一旦清晰，就发现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的展开即是历史的展开，历史的展开即是逻辑的构成，两者之间有着相互支援和相互印证的关系。因此，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发

现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由史到论，论从史出，从而对我们今天辩证地思考和处理农商关系问题产生借鉴意义。

从农商关系思想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和穿引中国经济思想史，并且用的是哲学思维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这无疑是想精心编织一张“知识之网”。然而这张网无论编织得多完美，也必定会有一些“问题”之鱼漏网而过（任何知识之网都如此）。在这里，我们只求没有漏掉吞舟之鱼。因此，我们把本书称为“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并不仅只是出于我们的学力和识见有限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本书的特点和视野。